

新时代经济责任审计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 CBBPS 分析框架

李普玲¹, 曹 鹏²

(1. 西北政法大学 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2; 2. 陕西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与法学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摘 要] 推动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的重要命题。经济责任审计作为直接监督领导干部履职行为的制度安排, 其实施过程本身就是矫正政绩观偏差的关键机制。以“理论框架—现实动因—作用机制—实践路径”为主线, 构建由认知 (Cognition)、行为 (Behavior)、底线 (Bottom Line)、过程 (Process) 和系统 (System) 构成的 CBBPS 分析框架, 系统阐释经济责任审计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研究表明, 经济责任审计通过价值纠偏、责任锁定、安全约束、程序校验与利益整合五重递进机制协同作用, 推动政绩监督从外部约束走向内生引导。应从完善潜绩导向的经济责任评价体系、建立项目全生命周期责任评价制度、强化重大风险事项穿透式审计监督、构建全过程决策责任追溯闭环以及搭建跨区域协同审计监督网络等方面优化经济责任审计实践。

[关键词] 经济责任审计; 正确政绩观; 国家审计; 国家治理; 审计监督; 干部治理; 穿透式审计

[中图分类号] F239.4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4833(2026)05-0012-11

一、引言

领导干部的政绩观问题本质上是公共权力运行过程中价值导向与行为选择的集中体现, 不仅关系领导干部个体的履职方式, 而且影响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和国家治理效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责任审计承担着规范权力运行、强化责任锁定和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职能。《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确提出, 经济责任审计应聚焦经济责任, 客观评价, 揭示问题,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促进全面深化改革, 促进权力规范运行。经济责任审计不仅具有监督纠错功能, 而且能够通过责任追溯、风险揭示和绩效评价等方式影响领导干部的决策逻辑和行为预期, 在推动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治理作用。

2026 年 7 月 13 日, 中央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十四次全体会议进一步强调, 经济责任审计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审计类型, 在强化对“一把手”和班子成员监督、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规范权力运行和责任落实等方面, 发挥着独特重要作用。这一论断揭示了经济责任审计在制度属性与治理功能上的独特性, 其独特作用不仅体现为对权力运行的事后监督, 更在于将“正确政绩观”的评价标准嵌入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履行的全过程, 使审计监督从合规性检查手段升维为价值引导工具。然而, 现有研究更多关注经济责任审计对腐败治理、财政绩效、权力监督以及干部治理等方面的影响, 对于经济责任审计如何推动正确政绩观形成的内在机制仍缺乏系统解释。

基于此,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将经济责任审计的治理效应研究从“是否有效”的结果检验拓展至“何以有效”的机制解释, 构建价值纠偏、责任锁定、安全约束、程序校验与利益整合五重递进机

[收稿日期] 2026-05-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5XGL00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 (24BJY188); 审计署重点科研项目 (24SJ03003); 西北政法大学省部级科研机构科研项目 (SJJC202409)

[作者简介] 李普玲 (1978—), 女, 陕西长安人, 西北政法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从事经济责任审计研究, E-mail: 514151777@qq.com; 曹鹏 (1986—), 男, 陕西安康人, 陕西理工大学经济管理与法学学院讲师, 从事国家审计与审计法治研究。

制,揭示经济责任审计推动正确政绩观形成的内在逻辑;第二,识别并类型化“重显绩轻潜绩、重短期轻长远、重发展轻安全、重形式轻实效、重局部轻全局”五类典型政绩观偏差,明确经济责任审计介入的现实场景与治理对象;第三,从评价体系优化、全周期责任监督、重大风险穿透审计、决策责任追溯以及跨区域协同监督等维度提出实践路径,为经济责任审计更好地发挥引导正确政绩观的功能提供制度设计参考与实践路径支持。

二、文献回顾

(一)制度演进下经济责任审计的分域考察

经济责任审计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企业实践。1986年我国设立厂长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制度,此后逐步向党政领导干部拓展,其相关制度、法律不断完善,展现鲜明的中国特色^[1]。该制度立足我国政治体制与干部监督需求,构建了由多方审计关系人、制度体系和基本认知三要素构成的经济责任审计能力分析框架^[2]。作为典型的中国特色制度,经济责任审计体现了实践推动制度、制度倒逼理论的逻辑,其实践发展始终领先于理论发展,理论更多是对实践经验的提炼与升华^[3]。

在国有企业领域,经济责任审计研究起步较早,已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积累与实证证据。从制度演进来看,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审计经历了从起步探索到成熟定型的历程,其根本目标始终是服务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4]。近年来,基于2019年《规定》的准自然实验发现,经济责任审计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水平^[5]。经济责任审计还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减少了国有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进而提升了公司价值^[6]。经济责任审计广度与力度的提高不仅有效降低了国企的代理成本,维护了社会信誉,而且明显提升了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7]。经济责任审计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国有企业,其同样改善了政商关系,促使民营企业将更多时间投入市场活动^[8]。政府审计质量也被证实能够缓解国有企业股权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损害^[9]。

在事业单位与党政机关领域,经济责任审计研究主要围绕审计风险、公共投资效率、审计能力提升及领导干部评价等议题展开。针对高校内部经济责任审计,现有研究指出,有必要通过分类管理、离任交接等方式推进有重点的审计全覆盖^[10]。在政府治理领域,经济责任审计被证明能够显著提升政府公共投资效率^[11]。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面临审计能力与新时代要求存在差距、评价与成果运用不充分等现实困境,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政策研究+数据分析+现场审计”的新型审计模式^[12]。省部级党政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则进一步面临与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协调难题,亟须提升预算执行审计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13]。

(二)价值导向下正确政绩观的逻辑辨析

关于“政绩为谁而树”这一根本性问题,现有研究普遍从价值立场出发,强调正确政绩观所彰显的人民性与为民造福的核心取向。学界指出,正确政绩观首先回答的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重大政治命题,明确将人民满意作为衡量政绩的最高标准^[14]。在这一维度上,以人民为中心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要求党员干部在施政过程中始终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利益作为首要考量^[15]。从政德建设的角度看,守公德意味着必须坚守人民立场、恪守为民宗旨,这是正确政绩观不可动摇的价值底线^[16]。此外,还有学者从群众史观出发,论证了人民群众既是历史创造者,也是政绩最终评判者的哲学依据,从而为“为民造福”提供了深层理论支撑^[17]。

关于“树什么样的政绩”这一核心议题,现有研究主要从政绩的内容标准和形态结构两个层面展开平行探讨。在内容标准上,正确政绩观要求遵循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的政绩必须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综合检验^[18]。有研究强调,高质量发展的政绩不是片面追求经济增速的“显性政绩”,而是涵盖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多维目标的系统成效^[19]。在形态结构上,学界特别关注显绩与潜绩、当下与长远的辩证关系,指出正确政绩观要求党员干部在保持工作连续性的前提下推进事业发展,既要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的好事^[20]。

关于“靠什么树政绩”这一实践路径问题,现有研究从主体修养、实践方法和制度保障三个相对独立的层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回答。在主体修养层面,党性被公认为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决定性因素,党性修养决定党员干部的价值取向与行为规范,政绩观偏差错位的根源正是党性弱化,表现为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和纪律观念松弛^[21]。在实践方法层面,有研究强调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处理好主观与客观、当下与长远、局部与整体、对上与对下等多重辩证关系,以科学决策和真抓实干来创造实绩^[22]。在制度保障层面,政德建设的制度化、党内法规的刚性约束以及监督问责机制的综合发力,也为正确政绩观的落地提供了长效保

障^[16]。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更是从组织推动的角度强化了制度与教育的协同效应^[23]。

(三) 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底与实证参照。在经济责任审计研究领域,学界已从多维度证实其对企业行为、政府治理及区域发展的积极治理效应,并逐步从“是否有效”的终端检验转向作用机制的探讨。在正确政绩观研究领域,学界从价值立场、内容标准与实践路径三个层面系统阐释了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内涵与时代要求,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话语体系。

然而,既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研究领域相对独立,缺乏有机联结。经济责任审计研究多聚焦其经济后果与治理效应,正确政绩观研究则侧重理论阐释与价值倡导,两者之间尚未建立系统的理论映射与机制关联。第二,作用机制的解释链条尚不完整。现有实证研究回答了经济责任审计是否有效,但对经济责任审计如何具体影响领导干部的政绩认知与行为选择这一内在转化过程缺乏深入揭示,导致从审计行为到政绩行为的中间环节未能得到充分阐释。第三,实践路径有待具象化。已有研究多提出原则性建议,缺乏与经济责任审计实务操作层面深度对接、与典型政绩偏差类型精准对应的可操作路径。

基于此,本文以公共受托责任理论、国家治理理论与制度变迁理论为分析框架,聚焦“监督何以引导”这一核心问题,系统构建经济责任审计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作用机制与实践路径,尝试打通从外部约束到内生引导的理论逻辑,为完善中国特色干部监督体系提供新的分析视角。

三、经济责任审计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框架与现实动因

(一) CBBPS 分析框架的构建逻辑与比较优势

CBBPS 分析框架由认知(Cognition)、行为(Behavior)、底线(Bottom Line)、过程(Process)和系统(System)五个维度构成,旨在系统阐释经济责任审计推动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逻辑。为明确该框架的理论定位与方法论特色,有必要将其与既有成熟框架进行比较分析。基于此,本文选取国家审计准则中“计划—实施—报告”的程序框架(以下简称程序框架),从维度分层逻辑和递进传导关系方面进行比较。在维度分层逻辑上,程序框架以审计项目流程为划分标准,旨在规范程序合规性;CBBPS 框架则从政绩观偏差的类型出发,将五个维度分别对应“重显绩轻潜绩”的价值判断偏差、“重短期轻长远”的行为选择偏差、“重发展轻安全”的风险认知偏差、“重形式轻实效”的程序执行偏差以及“重局部轻全局”的利益协调偏差,拟实现分析维度与问题域之间的精准映射。在递进传导关系上,程序框架虽体现为线性流程,但主要反映工作程序的先后顺序;CBBPS 框架则遵循“认知—行为—底线—过程—系统”的递进路径,领导干部的政绩行为始于价值认知,认知偏差外化为短视决策,短视决策突破风险底线,底线失守导致程序空心化,最终演变为系统层面的整体低效。

(二) 理论透镜:经济责任审计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分析框架

公共受托责任理论认为,多层委托代理链条中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代理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而偏离委托人利益^[24]。经济责任审计是国家审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监督体系的一环,其以制度化方式检验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及相应政治责任的情况,通过系统收集与评价履职证据,判断其是否依法、合规、有效履行受托责任。这一理论为本文分析经济责任审计如何矫正部分领导干部追求短期显性政绩而忽视长期潜性政绩的行为偏差提供了逻辑起点。

国家治理理论认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由决策、执行、监督等子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各子系统之间需要形成有效的协调与制衡^[25]。国家审计在监督子系统中承担“查病、防病、治病”的功能^[26],经济责任审计通过识别领导干部在政绩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向决策与执行环节反馈预警信息,并推动整改与责任认定。在此框架下,正确政绩观不仅依赖领导干部的个体觉悟,更须嵌入治理闭环中获得制度性保障。经济责任审计通过将问题暴露于监督视野之下,使其面临审计整改与问责。这一理论为本文分析经济责任审计如何矫正部分领导干部“重发展轻安全”的政绩观偏差提供了学理依据。

制度变迁理论指出,制度环境的变化会改变行为主体面临的选择集合与激励结构,从而引导行为方式的演变^[27]。制度激励理论则进一步强调,制度安排通过塑造行为主体的成本收益预期来影响其行为决策^[28]。将这两组理论运用于领导干部政绩行为分析可以发现,领导干部在任期内选择追求短期显绩还是注重长期潜绩,并

非纯粹的个人偏好问题,而是在既有制度约束与激励条件下作出的个体理性回应。经济责任审计作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通过任中审计与离任审计的全覆盖改变领导干部政绩行为的成本收益结构。对于成本收益预期的制度性调整,也从动因层面驱动领导干部主动调整其行为选择。这一理论为本文破解“重形式轻实效”与“重局部轻全局”的政绩观偏差提供了分析视角。

上述三重理论从委托代理、治理结构与制度激励层面提供了分析基础,而经济责任审计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过程还涉及领导干部个体的心理调适机制以及区域层面的决策互动结构,为此,本文进一步引入认知失调理论、集体行动理论与博弈论作为补充分析视角。认知失调理论认为,当个体面临与自我认知相悖的确凿证据时会产生心理不适,进而驱动其改变行为或调整认知^[29],经济责任审计可借此阐释审计信息如何打破领导干部面对负面绩效时的自利性归因偏差,揭示价值纠偏的微观心理机制。集体行动理论指出,除非存在强制或选择性激励,否则理性个体不会自动追求集体利益^[30]。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模型则表明,个体理性行为在缺乏协调时将导致集体陷入次优均衡^[31],经济责任审计可综合运用这些理论,分析地方政府间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的困局,阐明如何通过改变信息结构引导区域决策从局部最优转向全局最优。

(三)类型建构:政绩观偏差的分类维度与判定标准

为系统识别和剖析领导干部在政绩实践中偏离正确导向的行为模式,本节构建了一个包含五类典型偏差的类型学框架。每一类偏差均明确了其行为特征、内在机理以及经济责任审计的关键介入点,如表1所示。

表1 政绩观偏差类型学编码表

偏差类型	分类维度	政绩观错位逻辑	判定标准	审计介入点
盲目举债与形象工程	显绩-潜绩	追求短期可视化、工程化政绩,将未来财政压力和长期运营成本外部化	超出财力或绕开预算约束实施工程建设、城市更新、楼堂馆所、形象项目等,并形成债务压力或低效资产	穿透资金来源、核算隐性成本、评估显绩与潜绩的净效应
违规决策与损失浪费	短期-长远	任内追求快速见效,忽视项目全生命周期效益,形成任内决策、任后买单	重大经济事项论证不足、未经批准、决策不当、资产闲置、投资低效或造成国有资产损失	追溯决策链条、核验审批依据、评估项目生命周期绩效和损失责任
风险积聚与资金挪用	发展-安全	以发展或保运转为名突破财政金融安全底线,将风险后置化、隐性化	挤占挪用专项资金、违规担保、财政兜底、化债不实、隐性债务风险积聚或金融风险外溢	追踪资金流向、识别担保承诺和化债真实性,明确发展与安全的底线边界
程序合规与实质正义脱节	形式-实效	以会议纪要、审批、招投标等程序外观掩盖实质论证不足和绩效偏离	程序材料看似齐备,但集体决策、招投标、绩效管理、验收评价等环节流于形式或与实际效果脱节	比对会议记录、审批时间、招投标材料、绩效目标和实际效果
辖区利益最大化与区域整体低效	局部-全局	单个辖区追求局部收益或规模扩张,导致区域资源重复配置和整体效率损失	重复建设、同质化竞争、跨区域协同不足、超出消纳和配套能力上马项目、产业或园区低效布局	跨地区、跨项目比较,核算局部收益与区域整体成本

(四)经验证据:审计公开文本中五类政绩观偏差的描述性统计

为验证上述类型学框架的现实对应性,本节使用Python工具从10份公开文本中提取90个问题条目,涉及金额总计8000.99亿元(见表2)。统计显示,五类

政绩观偏差中,盲目举债与形象工程条目数最多,涉及金额2843.13亿元,表明违规举债和过度追求短期显绩仍为首要问题;风险积聚与资金挪用次之,但涉及金额最高,凸显重发展轻安全导向下资金违规使用及隐性债务风险已具有较大规模;程序合规与实质正义脱节和违规决策与损失浪费合计约占30%,反映形式合规掩盖实质违规以及决策不当造成的资源浪费问题同样突出;辖区利益最大化与区域整体低效仅1条,涉及金额1.20亿元,尽管公开文本中显现频率最低,但其结构性矛盾的潜在影响仍不可忽视(见表3)。上述分布特征为后续作用机制分析与典型案例验证提供了量化基础。

(五)现实动因:五类政绩观偏差

上文从公共受托责任、国家治理与制度激励三个理论维度阐释了经济责任审计推动正确政绩观何以可能。然而,理论上的可行性尚需回应现实中的必要性:实践中部分领导干部的政绩行为是否真的偏离了正确导向?经济责任审计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分析框架与现实动因之间的映射关系如图1所示。

表2 文本样本来源统计表

文本来源	文本数量	提取问题 条目数	涉及金额合计 (亿元)	主要用途
审计署审计工作报告	4	46	5455.03	提取审计发现问题
财政部隐性债务问责通报	6	44	2545.96	提取隐性债务问责案例
合计	10	90	8000.99	

表 3 五类政绩观偏差描述性统计

偏差类型	分类维度	问题 条目数	占比	涉及金额 条目数	涉及金额合计 (亿元)	典型关键词
盲目举债与形象工程	显绩 - 潜绩	40	44.44%	39	2843.13	隐性债务、违规举债、垫资、融资代建、城市更新、土地一级开发、基础设施、楼堂馆所、文化广场、超标准建设、专项债闲置
违规决策与损失浪费	短期 - 长远	11	12.22%	10	231.25	违规决策、决策不当、未经批准、可研不足、损失浪费、闲置、低效无效、国有资产流失、重复投资
风险积聚与资金挪用	发展 - 安全	23	25.56%	19	3604.77	挤占、挪用、截留、套取、违规担保、财政兜底、最低收益、回购、化债不实、借新还旧、风险隐患、偿债
程序合规与实质正义脱节	形式 - 实效	15	16.67%	9	1320.64	会议纪要、专题会议、常务会议、集体决策、审批、招投标、政府采购、绩效目标、验收、事后补签、程序不到位
辖区利益最大化与区域整体低效	局部 - 全局	1	1.11%	1	1.20	重复建设、同质化、产能过剩、消纳、外送、配套保障、区域协同、地方保护、园区闲置、产业雷同
合计		90	100%	78	8000.99	

政绩观偏差之一是盲目举债与形象工程。在公共受托责任理论框架下,这种行为表现为代理人偏离委托人长期利益。受任期考核压力的驱动,部分领导干部将公共资源过度集中于短期内可量化、可视化的经济指标与地标工程,其操作手段通常包括绕过预算约束,通过融资平台或国有企业垫资,建设缺乏实际公共服务效益的广场、楼堂馆所及景观项目。这类工程往往使用率低下,且巨额债务负担被转嫁给后续任期与辖内公众。该偏差直接体现了共性逻辑中的时间维度成本转嫁,即领导干部在任内获得政绩收益,而偿债责任被转移至后续任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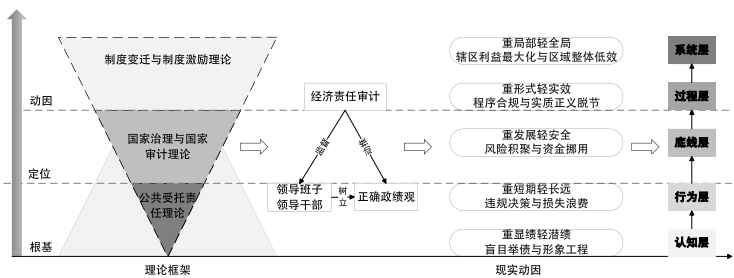


图 1 “理论框架 - 现实动因”映射关系

政绩观偏差之二是违规决策与损失浪费。从公共受托责任理论的审慎性义务出发,此类行为可理解为代理人对跨期责任承担的忽视。部分领导干部为在任期内快速展现工作成效,倾向于省略或虚化可行性研究与风险评估,偏好投资回收期短但生命周期效益低的项目。其后果往往在离任后才充分暴露,形成“任内决策、任后买单”的格局。该偏差将“收益当期化、损失滞后化”的共性逻辑进一步放大,是第一类偏差在投资端的延伸。

政绩观偏差之三是风险积聚与资金挪用。在国家治理理论的分析框架中,此类行为可定位于发展速度与安全底线的失衡。部分领导干部将经济增长置于风险防控之上,以牺牲财政安全和金融稳定为代价换取短期发展,具体形式包括违规承诺财政兜底以吸引社会资本、默许融资平台突破监管红线举债。该偏差将共性逻辑中的成本从可计量的债务本息扩展至难以量化的系统性风险,是第一类偏差的强化形态。

政绩观偏差之四是程序合规与实质正义脱节。从制度变迁与制度激励理论的视角看,此类行为可理解为制度执行中激励结构失效的表现。现实中,决策程序表现出程序与实质的背离,会议纪要、签批文件、流程记录等要件看似齐全,但实质上决策过程缺乏充分论证与民主讨论,主要领导先行定调、专家意见选择性采纳、会议记录事后补签等现象普遍存在。该偏差是前三类偏差得以获得形式合规认定的程序性条件。

政绩观偏差之五是辖区利益最大化与区域整体低效。在制度变迁与制度激励理论中,此类行为定位为非合作博弈导致的集体非理性。在晋升锦标赛式的激励结构下,各地方政府追求辖区利益最大化,其偏差表现在多个环节:在招商引资环节,部分地区竞相出台超越财政能力的土地出让、财政奖补、与税收挂钩的返还等优惠政策,引发恶性引资竞争;在产业布局环节,多地盲目上马同质化项目,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该偏差将共性逻辑从时间维度扩展至空间维度,将决策成本转嫁给其他辖区或整体区域。

四、经济责任审计推动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作用机制

经济责任审计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五大机制,同样遵循“认知 - 行为 - 底线 - 过程 - 系统”的递进逻辑,形成从价值判断到制度约束、从个体决策到区域协调的完整作用链条。五大机制依次递进、前后承接,共同构成经济责任审计推动正确政绩观的机制体系(见图 2)。

(一) 价值纠偏效应

价值纠偏效应对应“认知”维度,其核心功能是通过揭示隐性成本与长期风险,推动领导干部在显绩与潜绩之间实现理性权衡。基于认知失调理论,该机制通过揭示潜在成本和长期风险,使领导干部重新评估政绩评价标准,形成对显绩与潜绩的理性权衡。其作用可概括为三方面的协同运行。首先,显性穿透能够使分散在不同责任主体和会计期间的隐性成本得以完整呈现。经济责任审计通过穿透融资平台债务结构、项目资金来源及偿还责任,将原本被分散的长期风险和潜在成本在制度和信息层面显性化。领导干部能够清晰地看到短期显绩与长期公共负担之间的关系,从而削弱以债充绩、重短期轻长远的行为动机。其次,成本核算应将潜绩纳入决策考量。经济责任审计通过量化低效项目、闲置资产以及重复建设的社会成本,将沉淀在账面资产中的无效投入界定为真实损失;同时,将民生效益、生态价值、财政可持续性等长期指标纳入考核框架,实现跨期成本与收益对比。最后,平衡引导可通过显绩与潜绩并表核算,将短期经济指标与长期发展指标置于同一评价体系,形成跨期平衡的决策框架。在制度化激励下,任何追求短期显绩但隐藏长期隐性成本的行为,在整体评价中都将呈现负向净效应。该机制通过制度约束将跨期成本内化为决策者理性选择的一部分,使短期政绩行为受到制度性制衡,推动领导干部决策行为在当期收益和长远潜在成本之间实现动态平衡。

(二) 责任锁定效应

责任锁定效应对应“行为”维度,其核心功能是将权力行使与后果承担制度化绑定,实现跨期责任归位。公共受托责任理论认为,受托人在拥有资源配置权和决策权的同时,应承担相应的受托责任。然而,在任期约束条件下,部分领导干部在任期内追求可见的政绩收益,而将潜在风险和长期成本转嫁给未来财政、后任领导或辖内公众。经济责任审计可以通过强化责任识别与责任追溯机制,推动权力运行与责任承担重新统一。

其一,经济责任审计可以通过构建完整的责任链条,实现决策行为与经济后果之间的有效连接。在传统治理环境下,重大项目往往涉及多个部门和多层级主体,时间周期较长,责任边界容易模糊,导致决策失误难以准确归责。经济责任审计通过对决策程序、资金流向、资产运营以及项目绩效进行全过程审查,将经济事项的形成过程与责任主体对应起来,使决策依据、实施过程和最终结果之间形成可追溯的证据链条。其二,经济责任审计易于突破以任期为边界的评价逻辑,将重大经济决策置于更长时间跨度中加以观察和检验。如果仅依据任期内绩效进行评价,容易形成“前任决策、后任买单”的治理困境。经济责任审计通过将项目全生命周期纳入评价范围,对财政可持续性、资产运营效率以及长期公共效益进行持续跟踪,使那些被短期绩效掩盖的风险和成本逐步显现出来。其三,终身问责制度的建立将进一步强化责任锁定效应。随着经济责任审计与纪检监察、巡视巡察等监督机制的协同联动,领导干部无论调离、晋升还是退休,其任内重大决策造成的经济后果均可能被追溯认定并由其本人承担相应责任。这种制度安排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离任即免责”的行为预期,使领导干部在决策过程中更加关注长期效益和风险控制,从源头上抑制短期主义和机会主义行为。

(三) 安全约束效应

安全约束效应对应“底线”维度,其核心功能是划定财政安全边界并约束高风险增长模式,推动发展与安全动态平衡。国家治理理论认为,现代治理体系不仅需要激励发展,更需要防范风险。当发展目标脱离资源约束和风险边界时,局部理性行为可能演变为系统性风险。因此,经济责任审计不仅承担评价经济绩效的职能,也承担识别风险、划定边界和维护安全的重要职责。

第一,经济责任审计可以通过风险识别功能增强领导干部对潜在风险的感知能力。长期以来,一些财政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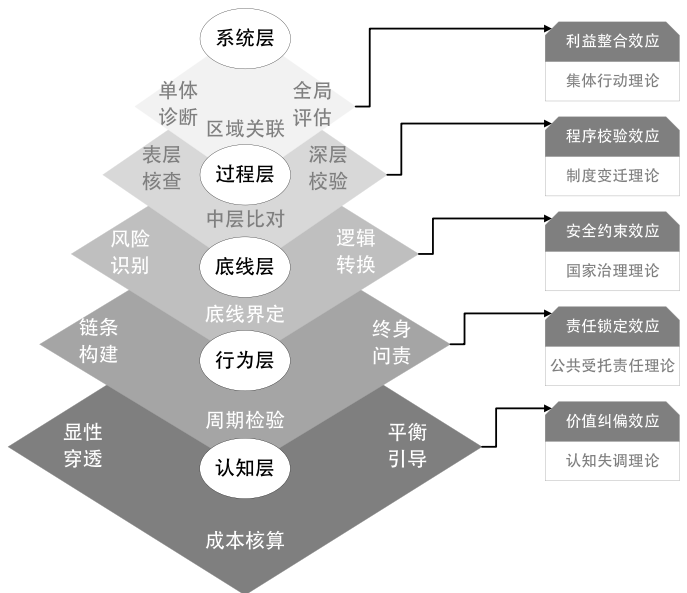


图2 经济责任审计推动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作用机制

险并非完全不可见,而是在追求增长和投资扩张过程中被有意或无意地弱化。隐性债务、违规担保、资金挪用以及超财力建设等问题往往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滞后性。在经济责任审计介入后,债务规模、偿债能力、财政承受水平以及项目现金流状况被纳入系统评价框架,原本被数据增长所掩盖的风险逐步显现。第二,经济责任审计能够进一步发挥底线界定功能。现实中,部分地方政府往往以改革创新、招商引资或加快发展为名突破财政约束,将本应受到严格监管的行为包装为发展需要。经济责任审计通过依据制度规范的要求,对违规举债、虚假化债和变相融资等行为进行事实认定和责任界定,从制度层面明确发展行为的合法边界。第三,安全约束效应可以推动领导干部发展逻辑的转变。经济责任审计通过持续揭示高风险增长模式的长期后果,使领导干部逐渐认识到发展与安全并非相互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由此,领导干部的决策逻辑逐步从规模扩张导向转向质量提升导向,从单纯追求短期增长转向兼顾安全与发展的动态平衡。

(四) 程序校验效应

程序校验效应对应“过程”维度,其核心功能是规范决策程序、强化论证质量与实质审查,以确保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相统一。与价值纠偏侧重认知重塑、责任锁定强调行为约束不同,程序校验更加关注决策过程本身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其目标是确保程序真正发挥约束权力、优化决策和防范风险的制度功能。

首先,从制度运行逻辑来看,程序校验效应体现在对决策程序完整性的监督。现实中,一些重大经济事项虽然经过集体研究和程序审批,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存在程序倒置、事后补签、会议流于形式等现象。形式上看程序已经履行,实质上却未能发挥民主决策和风险过滤功能。经济责任审计通过对会议纪要、决策记录、审批流程以及责任留痕等资料进行核查,重点关注决策程序是否完整、决策主体是否充分参与以及关键意见是否真实反映。其次,程序完整并不必然意味着决策科学。部分项目虽然经过可行性研究和专家论证,但由于论证过程中存在信息选择性披露、数据过度乐观估计以及论证结论预设等问题,仍会导致程序不合规乃至决策失误。因此,经济责任审计进一步将审查重点由程序形式延伸至论证质量,通过比较立项阶段的预测数据与项目实施后的实际绩效,检验决策依据是否充分、论证过程是否客观以及风险评估是否真实。最后,程序校验效应指向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经济责任审计通过穿透式审查决策背景、信息来源和权力运行轨迹,将评价重心由“程序是否存在”进一步提升为“程序是否有效发挥作用”,从而推动领导干部重新认识程序建设的治理价值。

(五) 利益整合效应

利益整合效应对应“系统”维度,其核心功能是整合区域利益、打破局部竞争壁垒,推动局部理性向整体理性转化。与前四项机制主要解决认知偏差、责任失衡、风险失控和程序失范等问题不同,利益整合效应更加关注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协调关系,其核心目标在于突破地方保护、部门分割和辖区竞争所导致的治理壁垒,引导领导干部从区域整体发展的视角审视政绩创造过程。

在地方治理实践中,领导干部往往以辖区发展绩效作为主要决策依据。其一,经济责任审计可以通过对单体项目进行效益诊断,揭示局部决策可能产生的资源错配问题。经济责任审计不仅关注项目本身是否合规及是否盈利,更关注其投入产出效率以及对区域整体发展的实际贡献。通过这种单体诊断,经济责任审计能够帮助领导干部认识到局部最优并不必然等同于整体最优,从而改变单纯追求辖区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倾向。其二,经济责任审计可进一步通过区域关联分析揭示不同地区、不同项目以及不同部门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借助跨区域数据比较和资源配置分析发现重复建设、同质竞争以及功能重叠等问题。这种分析可以使原本隐藏在局部决策背后的系统性低效问题得以显现。其三,利益整合效应最终体现为全局视角下的价值重估。经济责任审计能够通过引入机会成本分析和区域整体绩效评价,将局部政绩创造所带来的收益与区域整体发展所付出的代价进行综合比较。当领导干部能够清晰地认识到某些看似成功的局部项目实际上损害了区域整体资源配置效率时,其决策逻辑便会逐步由辖区利益导向转向整体效益导向。

(六) 案例验证:溆浦县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的实践检验

前文识别了五类典型政绩观偏差,并从理论层面构建了经济责任审计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五重作用机制。理论框架的合理性需在审计实践中加以检验,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开展的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为上述机制提供了典型的实践样本。2016 年 12 月,溆浦县在湖南省率先启动县级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对乡镇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及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相关部门同步实施审计。

从政绩观偏差识别来看,该案例集中反映了多重典型偏差。审计组将发现的问题归类为国土管理、矿产开

采、水资源利用、森林保护、空气污染等五个方面,共识别 48 项相关问题。砖瓦厂空气污染是典型问题,其实是“重发展轻安全”的政绩观偏差,即砖瓦生产等短期经济活动虽可产生可见税收与就业贡献,却以空气污染持续累积和矿山生态修复欠账不断加剧为长期代价。与此同时,砖瓦厂问题亦折射出“重局部轻全局”的偏差,单个企业的生产收益与全县生态保护、居民健康和长期资源利用之间存在根本性张力。经济责任审计将资源资产实物量和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纳入评价范围,亦显示出“重显绩轻潜绩”的偏差,短期经济活动的可见产出不应以牺牲生态质量等长期潜绩为代价。

从五重作用机制来看,该案例为本文理论推导提供了实证支撑。价值纠偏效应体现于审计将“生态账”纳入领导干部离任评价,改变了以经济产出为单一尺度的评价逻辑,使领导干部重新审视显绩与潜绩的相对权重。责任锁定效应体现于“1+N”综合审计模式和联席会议定性定责机制,审计对象涵盖乡镇党政领导干部及相关职能部门,将生态环境问题与具体责任主体制度化绑定。安全约束效应体现于通过空气质量检测等专业方法识别环境安全风险,将群众健康纳入发展绩效评价。程序校验效应体现于“六边推进”方法,即边测量、边分析、边审核、边排查、边汇报、边整改,确保审计发现问题可及时进入整改环节。利益整合效应体现于跨部门协同,即将乡镇治理、部门监管和群众环境利益纳入同一责任链,推动治理责任从单点监管转向协同治理。

五、经济责任审计推动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路径

前文基于公共受托责任理论、国家治理理论与制度激励理论,系统阐释了经济责任审计促进正确政绩观形成的五重作用机制。作用机制通过具体的制度安排和审计实践才可以真正转化为治理效能。因此,有必要围绕五类偏差及其对应机制,从评价体系优化、责任监督延伸、风险穿透治理、决策责任追溯以及区域协同监督等方面构建实践路径,推动经济责任审计治理效能向制度优势转化,如表 4 所示。

(一)完善潜绩导向的经济责任评价体系

第一,指标体系优化。经济责任审计应突破传统以经济增速、财政收入、投资完成额等显性指标为主的评价框架,增设能够反映长远效益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潜绩指标。具体而言,可引入“标准化金融负债变动率”,衡量领导干部任期内新增隐性债务与地方财力的匹配程度,从负债端约束以债务置换政绩的行为冲动;引入“存量资产盘活率”聚焦低效闲置资产的再配置效率,促使决策者关注既有资源的效益释放而非新增低效项目;同时增设“项目投产率”与“项目达产率”,区别于单纯的投资完成额,强调项目从建设到实际产出、从投入到效益的价值转化链条,防止“建成即闲置”的项目在账面上虚增政绩。

表 4 经济责任审计推动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现实动因、作用机制与实践路径

现实动因	分类维度	作用机制	实践路径
盲目举债与形象工程	显绩-潜绩	价值纠偏效应:显性穿透、成本核算、平衡引导	完善潜绩导向的经济责任评价体系:优化指标权重,引导关注长期绩效与可持续性
违规决策与损失浪费	短期-长远	责任锁定效应:链条构建、周期检验、终身问责	建立项目全生命周期责任评价制度:跟踪运营效果,遏制短期决策行为
风险积聚与资金挪用	发展-安全	安全约束效应:风险识别、底线界定、逻辑转换	强化重大风险事项穿透式审计监督:追踪表内表外风险,筑牢安全发展防线
程序合规与实质正义脱节	形式-实效	程序校验效应:表层核查、中层比对、深层校验	构建全过程决策责任追溯闭环:从源头到末端全程问责,推动实质负责
辖区利益最大化与区域整体低效	局部-全局	利益整合效应:单体诊断、区域关联、全局评估	搭建跨区域协同审计监督网络:突破辖区边界,促进整体资源配置效率

第二,评价权重重构。经济责任审计应通过权重的结构性改变重塑评价格局,将国有资产管理效益、债务风险度等核心潜绩指标提升至与经济增速、财政收入相近或更高的权重等级。可建立加权计分模型,科学设定显性指标与潜绩指标的权重比例,同时设置负向调节系数,当经济责任审计发现领导干部任内存在违规举债、形象工程无效投入等情形时,应依据成本核算机制所认定的隐性损失金额,按既定比例扣减其显性政绩得分,实现显绩虚高与潜绩亏空的真实绩效还原。

第三,评价结果运用。经济责任审计应依托财政、统计、自然资源等部门的政务数据平台,构建政绩偏差动态预警模型。该模型运用机器学习算法,对“标准化金融负债变动率”“存量资产盘活率”等潜绩指标设定动态阈值,并建立与显性指标的偏离度指数。当地区出现“GDP 增速高于阈值但债务率同步飙升”“投资完成额达标但项目达产率持续偏低”等典型背离模式时,系统自动触发相应等级的预警信息,并将预警实时推送至审计人员

终端及组织部门干部监督系统。

(二) 建立项目全生命周期责任评价制度

长期以来,一些重大项目出现决策失误、资源浪费甚至形成沉没成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项目绩效评价主要集中于建设阶段,领导干部对项目建成后的运营质量、实际效益和持续影响关注不足。经济责任审计应当改变这种以建设结果替代治理成效的评价逻辑,将监督重心进一步延伸至运营效果。

为实现全生命周期的可操作监督,有必要建立分阶段审计核查清单,明确各环节的审查要点:在立项决策阶段,重点核查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概算等文件是否经由有资质的机构编制并获审批备案;在建设实施阶段,重点核查招标文件编制是否规范、是否存在量身定制招标条件等排斥潜在投标人的情况,合同条款是否与招标文件和中标通知书一致、是否存在“阴阳合同”;在运营绩效阶段,重点核查项目是否达到设计目标和预期效益,项目移交和管护机制是否健全,对比可行性研究和合同约定的预期指标与实际产出,分析偏差原因及领导干部责任以及资产利用效率是否存在建成即闲置或长期低效运营的情况。

在数字化治理背景下,大数据、数字孪生、智能监测等技术手段为运营效果检验提供了新的实现路径。经济责任审计可以依托项目全生命周期数据平台,持续跟踪项目建设和运营状态。具体而言,可运用数字孪生技术对重大项目进行虚拟建模与实时监测,自动识别进度滞后、成本超支、效益不达预期等异常信号,建立项目运营绩效与决策责任关联机制,将项目投产后的经营状况、资产利用水平、财政影响纳入责任评价范围。数字技术的运用不仅可以提升监督效率,更重要的是增强跨周期责任识别能力,使项目长期效益能够持续进入领导干部经济责任评价体系,从而有效克服“只管建设、不管运营”“只顾当前、不顾长远”的短期行为倾向。

(三) 强化重大风险事项穿透式审计监督

首先,从表内核查来看,经济责任审计应以专项债券资金、财政直达资金等显性债务资金为核心对象,构建“拨付-使用-绩效”全链条追踪流程。审计人员逐笔比对资金拨付凭证与项目施工进度、工程结算单据,运用大数据分析识别资金长期滞留国库或项目单位账户的“沉淀”现象,以及将专项债资金违规用于“三保”支出、偿还国企到期债务等挤占挪用行为。同时,建立“问题清单-整改台账-销号管理”的闭环管理方式,对审计发现的违规问题督促立行立改,并追溯资金去向直至恢复合规用途。

其次,从表外穿透层面来看,针对地方政府以市场化运作、创新融资为名规避监管的倾向,经济责任审计须遵循“实质重于形式”原则,逐一拆解各类表外业务、通道业务及明股实债安排。经济责任审计中重点核查 PPP 项目与政府投资基金等主体是否存在财政兜底承诺、固定收益回购与隐性担保等变相举债行为,通过比对合同条款、还款来源与财政承受能力论证,识别名义上社会资本自担风险、实质上财政承担刚性兑付责任的隐性债务。

最后,智能穿透与风险传导网络分析。经济责任审计应运用资金流向知识图谱技术,对 PPP 项目、融资平台、政府投资基金等主体进行多层级股权穿透与资金链追踪;通过关联税务、工商、金融机构等跨部门数据,自动识别明股实债、财政兜底承诺等隐性债务的典型交易结构与资金闭环路径。进一步,构建区域财政风险传导网络模型,分析隐性债务风险在不同地区、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关联外溢效应,揭示因“重局部轻全局”导致的风险隐匿与转嫁行为。

(四) 构建全过程决策责任追溯闭环

在源头管控环节,经济责任审计应将审查前移至决策动议和立项论证阶段。通过调阅原始调研报告、可行性研究、专家意见及群众征求记录,重点核查数据可靠性、风险评估覆盖范围以及技术与财务论证的完整性。同时,可运用文本分析技术对不同版本的论证材料进行辅助比对,识别潜在信息选择性呈现或隐瞒风险的行为,使决策基础从纸面合规走向实质扎实,为后续建设和运营阶段提供科学依据。

在过程监测环节,经济责任审计应穿透会议记录和审批流程,通过交叉访谈、数据比对和行为验证,揭示决策过程中的形式化或偏差行为。例如,检查会议讨论是否存在充分博弈、是否保留不同意见、是否存在主要领导定调后集体附和的现象。通过实时跟踪项目建设及资金使用情况,将决策意图与实施过程的偏差显性化,实现“资金流-实物流-责任流”的闭环监督,促使领导干部在建设阶段持续关注项目合理性和资源有效配置。

在末端问责环节,经济责任审计应将决策执行结果与责任主体对应。借助区块链技术确保决策过程记录的真实性和不可篡改性,使决策文件、会议纪要、审批记录具备完整的时间戳和可追溯性;同时运用智能文本分析技术对会议纪要、决策记录进行自动比对,识别事后补签、程序倒置等异常模式;通过将决策偏差、执行失误及损

失风险与责任人挂钩,强化跨期责任意识,即便干部调离、晋升或退休,仍能通过档案和数字化记录落实问责。

(五)搭建跨区域协同审计监督网络

经济责任审计需要突破传统以单个地区、单个部门为对象的监督边界,逐步建立跨区域协同审计监督网络。可推行“异地交叉+统一标准”审计模式,对跨区域重大项目、同质化竞争领域由上级审计机关统筹调配审计力量,组建交叉审计组,统一审计标准与评价尺度;通过整合财政、统计、国资监管等多部门数据资源,构建区域层面的审计分析框架,对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以及重大项目安排等事项开展关联分析。

与此同时,经济责任审计还应强化纵向联动监督功能,将中央重大政策部署与地方落实情况纳入统一评价框架。对于保障性住房建设、新能源开发、开发区建设等具有明显跨区域特征的项目,经济责任审计不仅关注单个地区的执行效果,更关注不同地区之间的协同程度以及整体资源配置效率;通过从政策制定到执行落地的全链条监督,识别地方保护、重复投入和恶性竞争等问题,引导地方政府在区域发展战略中重新定位自身功能,推动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治理格局。

在数字化治理背景下,经济责任审计还可以借助大数据分析、知识图谱和智能评估等技术手段,对区域内土地、资本、产业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可运用要素配置效率评估模型,将单个地区的发展绩效放置于更大范围内进行比较和分析,识别表面上实现增长、实质上降低区域整体效率的行为模式。上级审计机关应制定跨区域协同审计工作规程,明确协同审计的组织方式、数据标准和责任划分;建立跨区域审计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会商跨区域重大审计事项;将区域协同发展绩效纳入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评价范围。

六、结论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经济责任审计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推动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使命。本文构建了“理论框架-现实动因-作用机制-实践路径”的系统分析框架,力求揭示经济责任审计从外部监督约束到内生行为引导的转化逻辑,夯实具有中国特色的审计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实践路径,创建适配中国情境的审计评价方法与监督工具。

本文分析认为,经济责任审计推动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具有以下四个主要特征:其一,经济责任审计不仅关注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性与合规性,更聚焦领导干部履职行为与经济后果之间的责任关系,实现从资金监管向责任治理的跃升;其二,经济责任审计覆盖领导干部任中与离任全周期,实现对重大经济决策、重点项目建设和重要风险事项的持续跟踪与闭环管理;其三,经济责任审计不仅要发现和纠正政绩观偏差行为,更要推动从制度层面完善评价体系与激励结构,促使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其四,经济责任审计强调显绩与潜绩、短期与长期、发展与安全、形式与实效、局部与全局的辩证统一,区别于传统的财政审计与绩效审计。

经济责任审计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完善中国特色干部监督体系、优化国家治理能力、保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中国审计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构成内容。当前,各级审计机关正积极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实践,不断深化审计结果运用与问责追责机制,经济责任审计正在实现从合规监督向价值引导的关键突破。未来有待进一步基于审计评价体系优化、全生命周期责任监督、穿透式风险审计、决策责任追溯以及跨区域协同监督等方向拓宽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推动经济责任审计的制度化、规范化、精准化和智能化,切实满足推动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防范短期行为和系统性风险的治理需要。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们需要通过经济责任审计促进高质量发展,保障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维护财政安全和民生福祉,推动干部治理现代化,进而实现经济责任审计从有形覆盖向有效治理的进一步跨越,促进我国审计监督制度更加完善且全面。

参考文献:

- [1] 吕文基. 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思考及评价体系[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02(1): 16-19.
- [2] 贾云洁, 王会金, 胡苏. 经济责任审计能力提升研究: 基于一个三维分析框架[J]. 审计研究, 2022(2): 52-59.
- [3] 孙宝厚, 彭新林, 王旭, 等. “审计法治与中国式现代化——纪念审计法颁布30周年”专题研讨会观点摘编[J]. 审计研究, 2024(5): 3-16.
- [4] 綦好东, 何源睿, 彭睿, 等. 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的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J]. 审计研究, 2022(5): 3-10.
- [5] 程博, 蔡云霏, 胡朝会. 经济责任审计对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效应研究[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25(5): 65-77.
- [6] 程博, 蔡云霏. 经济责任审计、代理成本与国有企业现金持有[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24(5): 107-121.
- [7] 蔡春, 马晴, 鲍瑞雪. 地方审计治理效果与国有企业社会责任[J]. 财经科学, 2023(11): 133-148.

- [8] 吴一平, 陈家和, 王伟. 经济责任审计与民营企业时间配置——来自中国微观企业调查的证据[J]. 经济科学, 2023(3): 168-184.
- [9] 张立民, 邢春玉, 温菊英. 国有企业政治关联、政府审计质量和企业绩效——基于我国 A 股市场的实证研究[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5(5): 3-14.
- [10] 黄海雁. 浅议如何推进高校内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J]. 财务与会计, 2016(24): 60.
- [11] 张霖琳, 刘瑾, 蔡贵龙. 经济责任审计是否提升了政府公共投资效率? [J]. 会计与经济研究, 2023(6): 54-72.
- [12] 审计署长沙特派办理论研究会课题组, 赵保林, 申博文, 等. 新时代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创新研究[J]. 审计研究, 2019(2): 11-17.
- [13] 审计署南京特派办理论研究会课题组, 周敦祥, 牟遥, 等. 省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创新研究[J]. 审计研究, 2019(2): 18-24.
- [14] 杨平, 徐贝琳. 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理论特质和实践路径[J/OL]. 人文杂志, [2026-06-09]. <https://doi.org/10.15895/j.cnki.rwzz.20260605.001>.
- [15] 赵卯生, 姜龙飞.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原则遵循与落实保障[J/OL].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6-06-09]. <https://doi.org/10.14100/j.cnki.65-1039/g4.20260603.001>.
- [16] 曲光华. 政德建设制度化: 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支撑[J]. 探索, 2026(3): 15-25.
- [17] 王增福.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正确政绩观的哲学基础[J/OL]. 求索, [2026-06-09]. <https://doi.org/10.16059/j.cnki.cn43-1008/c.20260530.013>.
- [18] 陈朋. 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逻辑理路[J]. 党的文献, 2026(1): 3-11.
- [19] 包银山, 刘晓帆. 新时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三重审视[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6(3): 8-16.
- [20] 柴奕. 中国共产党正确政绩观的核心指向与实践要求[J]. 思想理论教育, 2026(5): 31-38.
- [21] 张彦, 徐粤超. 以坚强党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逻辑关联与路径要求[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2): 25-32.
- [22] 陈金龙. 新时代正确政绩观的生成机制[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26(3): 26-35+156.
- [23] 阚道远, 谭壮.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基本要义、价值意蕴和实践路径[J]. 理论学刊, 2026(3): 24-34.
- [24] 秦荣生. 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理论与我国政府审计改革[J]. 审计研究, 2004(6): 16-20.
- [25] 徐湘林. “国家治理”的理论内涵[J]. 人民论坛, 2014(10): 31.
- [26] 王会金, 王素梅. 国家审计“免疫系统”建设: 目标定位与路径选择[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0(2): 17-22.
- [27] 黄鑫鼎. 制度变迁理论的回顾与展望[J]. 科学决策, 2009(9): 86-94.
- [28] 张恒. 非对称信息下的制度激励与信号显示[J]. 兰州大学学报, 2005(1): 89-92.
- [29] Festinger L.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 [30] 鹿斌, 金太军. 协同悖论: 集体行动困境分析的新视角[J]. 社会科学研究, 2015(4): 72-78.
- [31] 李莉. 信念与行动的矛盾: 单次囚徒困境博弈的重构与消解[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5): 58-65.

[责任编辑: 刘 茜]

Research on the Role Mechanism of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Audits in the New Era in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and Practice of a Correct View of Achievements: Based on the CBBPS Analysis Framework

LI Puling¹, CAO Peng²

(1. School of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i'an 710122,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Management and Law,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zhong 723000, China)

Abstract: Promoting leaders to establish and practice a correct view of political achievements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audits, as a system for directly supervising leaders' performance, are a key mechanism for correcting deviations in their view of achievements. This article follows the main line of 'theoretical framework—practical motivation—mechanism of action—practical path' and builds the CBBPS analysis framework, made up of Cognition, Behavior, Bottom Line, Process, and System, to systematically explain the internal logic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how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audits promote leaders to establish and practice a correct view of achievements. The study shows that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audits work through five coordinated mechanisms: value correction, accountability locking, safety constraints, procedural checks, and interest integration, pushing achievement supervision from external constraints toward internal guidance.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suggests optimizing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audit practices by improving the evaluation system that guides potential achievements, establishing lifecycle responsibility evaluation systems for projects, strengthening penetrative audit supervision of major risks, creating full-process decision accountability loops, and setting up cross-regional collaborative audit networks.

Key Words: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auditing; correct view of political achievements; national audit; national governance; audit supervision; cadre governance; penetrating audit